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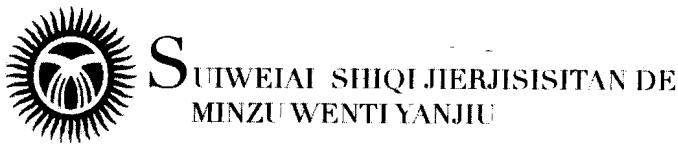
SUIWEIAI SHIQI JIERJISISITAN DE
MINZU WENTI YANJIU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 民族问题研究

民族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族问题长期积累、作用的结果。本书是对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专题研究，从民族自决、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教育三大方面，全面分析了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苏维埃民族政策在该地区的得失，因此，本书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苏联的民族问题，对做好国内的民族工作也具有借鉴意义。

邓 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 民族问题研究

邓 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研究/邓浩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ISBN 978 - 7 - 5004 - 9800 - 1

I . ①苏… II . ①邓… III . ①民族问题—研究—吉
尔吉斯—1927 ~ 1937 IV . ①D736. 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940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民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极少，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由于多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因而，诸民族之间就必然要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民族问题也就随之出现。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因而，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曾被苏联宣布为“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①，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最明显的成就之一”^②。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全苏推行公开性、民主化的政策，民族问题又成为困扰苏联并最终倾覆联盟大厦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民族问题在苏联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但是，由此完全否定苏联的民族工作也是片面的。对此，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苏联曾是一个包括 128 个以上民族的^③、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据 1989 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苏联总人口为 2.8574 亿人，其中，俄罗斯族占 50.8%，非俄罗斯族占 49.2%。苏联各民族使用 130 多种语言，信奉 10 多种宗教。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如此，对苏联的民族问题研究就不应仅停留在一般性的宏观论述分析上，而应该充分地考虑到其联盟内民族和地区巨大的差异，分民族、分地区地予以考察。只有这

① 参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6 页。

② 《苏联历史》编辑部：《苏联的民族过程：总结·趋势·问题》，《苏联历史》1987 年第 6 期。汉译文载《民族译丛》1988 年第 3 期。

③ M. H. 古博格洛文：《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首都的民族人口和语言情势》，肖勤节译，载《民族译丛》1993 年第 6 期。

样，才能对苏联民族问题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为此，本书选取了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具体地、历史地考察该地区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苏维埃民族政策在该地区的得失。毫无疑问，这对深入研究苏联民族问题是必要的、有所裨益的。

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是一个以吉尔吉斯族为主体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共有 80 多个民族，总人口为 436.7 万人（1989 年统计数），其中，吉尔吉斯族占 52.4%，俄罗斯族占 21.5%，乌兹别克族占 12.9%，其余民族如乌克兰人、德意志人、鞑靼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东干人、塔吉克人等占 13.2%^①。吉尔吉斯斯坦位于中亚的东北部，北邻哈萨克斯坦，西南邻塔吉克斯坦，西邻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面和东面与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总面积为 19.85 万平方公里^②。

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和中亚的其他主体民族在语言、历史、文化诸方面均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从语言上看，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从文化上看，吉尔吉斯族和苏维埃时期中亚其他 4 个主体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彼此之间保持着基本相似的伊斯兰文化传统。研究以吉尔吉斯为主体民族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苏维埃时期整个中亚的民族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是苏联的边疆地区之一，毗邻我国的新疆地区。无论在语言文化上，还是在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上，吉尔吉斯斯坦和新疆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鉴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工作上曾受到过苏联的相当影响，因此，对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将会对我国的民族工作，尤其是新疆的民族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所谓民族问题，是指“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③。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既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又是一个按“民族性原则”组建的加盟

^① Чотонов Усеналы, *Суверенный Кыргызстан: выб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ути*. Бишкек: Кыргызстан, 1995, стр, 9.

^② Ibid.

^③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8—349 页。

共和国，因此，在苏维埃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其民族问题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产生的问题；另一种是联盟中央和民族自治体之间产生的问题。同时，由于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方面”^①，因此，本书对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分别从民族自决、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教育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这有助于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的各个侧面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研究的时段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时期本书称之为“苏维埃时期”，它包括1917—1922年的苏俄时期和1923—1991年的苏联时期。由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间短，且基本沿袭了勃列日涅夫的政策，特点并不明显，故笔者将他们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归并到一起论述，未予单独列节。

关于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散见于苏联民族问题或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论著中^②，缺乏系统性，也欠深入，但毕竟开辟了本课题的研究。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注意对有关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本书使用的资料主要包括：（1）苏联编纂的各种文献资料集。如“К вопрос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ргизстана (1924 – 1937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Фрунзе: Кыргызстан, 1974; “История колхозиза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Киргизии (1929 – 1934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Фрунзе: Илим, 1989; “История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1926 – 1941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Фрунзе: Илим, 1972等。（2）苏联出版的各种统计资料汇编，包括中国学者据此编写的统计资料汇编。如“Киргизия в цифрах: стат. сборник” . Фрунзе, 1963;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стат. сборник” . Фрунзе, 1964; 浦开夫编《苏联中亚五共和国统计资料汇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油印本）等。（3）有关研究论著中使用

^①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49页。

^② 参见赵常庆、陈联璧、刘庚岑、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308页。

的资料。如 Бактыгулов ДЖ. С.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иргизского аила” . Фрунзе: Илим, 1978; Соктоев И. А.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иргизстана” . Фрунзе: Илим, 1966 等。前两类属于第一手资料，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第三类属于第二手资料，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使用价值。本书在研究中还使用了报纸、杂志上登载的资料。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自决问题	1
一 十月革命以前的民族自决问题	1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自决问题	6
(一)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8
(二) 中亚民族划界和吉尔吉斯苏维埃民族国家的形成	13
三 联邦制的变形和民族自决问题	19
四 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新构想与吉尔吉斯苏维埃民族国家形式的终结	30
第二章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经济问题	38
一 苏维埃时期的农业经济问题	38
(一) 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前的农业经济问题	40
(二) 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农业经济问题	49
(三) 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后的农业经济问题	72
二 苏维埃时期的工业经济问题	83
(一) 十月革命前的工业经济状况	85
(二) 苏维埃时期工业经济问题的形成和发展	86
第三章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文化教育问题	103
一 苏维埃时期的民族教育问题	103
(一) 十月革命前的教育状况	103

(二) 苏维埃时期民族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104
(三) 苏维埃民族教育发展的原因	124
(四) 苏维埃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	126
二 苏维埃时期的民族文化问题	128
(一) 文化教育问题	128
(二) 民族语言问题	135
(三) 民族历史问题	142
结语	146
附录	155
苏维埃时期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	155
苏维埃时期的中亚民族语言问题	170
苏维埃时期中亚的民族人口问题探略	186
苏维埃时期中亚的民族历史问题探略	194
试析新疆与苏维埃中亚早期关系的背景	205
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	214
文明和谐与构建和谐世界	225
主要参考文献	229

第一章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自决问题

民族自决问题是一个民族自决权的运用和实现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民族自决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列宁的民族理论的核心就是民族自决权，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概而言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各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自主权，即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是民族自决权的一种表现形式；（3）承认各民族有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在十月革命前，民族自决权是各被压迫民族彻底反对沙皇的殖民统治、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平等、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重要原则；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民族自决权又是促进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平等、民主和相互信任基础上实行联合、加强各民族团结的重要原则^①。本章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对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自决问题作一探索。

一 十月革命以前的民族自决问题

十月革命以前，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Кыргызстан）隶属于俄国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边区。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地区，它现今所辖的地区当时分属突厥斯坦边区不同的行政区，如奥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5页；《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什（Ош）、贾拉拉巴德（Джалал – Абад）属于费尔干纳（фергана）州；比什凯克（Бишкек）、卡拉库尔（Каракол）属于七河（Семиречье）州；塔拉斯（Талас）属于锡尔河（Сырдоръя）州；苏柳克塔（Сулукта）煤矿属于撒马尔罕（Самаркант）州。吉尔吉斯斯坦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是和突厥斯坦乃至整个中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单独形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地区之前，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自决问题是包括在突厥斯坦乃至整个中亚的民族自决问题之中的。因此，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对十月革命以前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自决问题将更多的从整个中亚的视角予以分析。

在沙皇俄国入侵中亚以前，中亚民族（包括吉尔吉斯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氏族部落传统的自然发展状态的影响，当时尚不具备形成一种强烈自觉的民族共同体生存与发展意识的条件，可以说，当时建立在氏族或部落等亚民族结构基础上的中亚各民族大体上未超出自在民族的发展阶段。不过，由于民族起源和伊斯兰教传播的原因，在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等中亚民族中已存在着大致相似的突厥文化传统，而在包括塔吉克族在内的所有中亚民族中则已形成了虽各具特色但却基本一致的伊斯兰民族文化。随着 19 世纪开始的沙皇俄国入侵中亚，特别是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俄国完全征服中亚，中亚民族便开始迅速由自在民族走上了自觉民族的发展道路。这时，中亚当地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和沙俄殖民主义的矛盾骤然凸显出来，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沙皇俄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政一体的统治机构的设立，严重破坏了中亚当地民族的政治自主权。

（2）沙皇政府推行的鼓励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等欧洲移民移居中亚的政策，严重地侵犯了当地民族尤其是吉尔吉斯族和哈萨克族对自己所属土地的所有权，正如列宁所说：“移民用的土地是靠疯狂地损害土著居民的地权而得来的……结果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形成了直接敌对关系。”^①

（3）随着俄罗斯语言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向中亚地区的发展而出现的俄罗斯化、西方化或近代化倾向，虽然在某些方面为该地区带来了先进的

^① 《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1—82 页。

文化内容，但作为异质文化却激化了其与中亚当地突厥或伊斯兰民族文化间的紧张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敌对心理或当地民族的排外心理。

(4) 以沙皇俄国政府为代表的大俄罗斯主义，明显使处在其殖民统治之下的中亚当地民族产生了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感和受歧视感。

总之，沙皇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和殖民统治，严重地侵害了中亚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造成了中亚民族深刻的文化和心理危机。中亚各民族（包括吉尔吉斯族）的民族自决问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最初提出中亚民族自决问题是与沙俄征服中亚同时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这两种思潮强调突厥民族或穆斯林民族的共同点和一致性，企图在反沙俄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统一力量，以达到争取民族平等或自主，甚至推翻殖民统治的目的。这两种思潮最初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中传播，到 19 世纪末，便扩展到了中亚地区，它最初是针对沙皇政府所奉行的大俄罗斯主义，是一种超民族性质的民族主义，其实质是在殖民统治下寻求保护本民族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在 1905 年以前，中亚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鼓动者的活动基本局限于开办改革学校，其中包括：1898 年在撒马尔罕和托克玛克（Токмак）创办的鞑靼改革学校、1901 年在塔什干（Ташкент）开办的改革学校等。在中亚地区，“对于每个人甚至是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并不是目的，而是回答至少是部分穆斯林日益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即如何摆脱目前的卑下地位与重现昔日辉煌的手段”^①。1905 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中亚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利用革命后短暂的宽松环境，于 1905—1907 年，以鞑靼和乌兹别克人为主，在本地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强烈抨击沙皇政府的独裁制度与殖民政策，捍卫中亚联合或统一的思想，致力于“为中亚的改变与突厥斯坦民族的振兴而奋斗”^②。1905—1906 年，中亚民族代表参加了主要在鞑靼和阿塞拜疆穆斯林的动议之下召开的三次俄国穆斯林

^①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ED. by Edward Allworth,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77.

^②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p. 193.

大会。其中，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包括全俄穆斯林一致联合行动、俄罗斯民族和穆斯林民族权利平等、穆斯林教育、印刷与出版自由以及尊重私有财产等。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俄国穆斯林联合会”为全俄穆斯林中心。第三次会议又将其更名为“穆斯林联盟”^①。1906年3月，在中亚塔什干，一些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及其他公民代表召开会议，建立了“穆斯林宗教机构”，要求保障宗教自由，保证不动产不征税，偿还游牧民被剥夺的土地等^②。

此外，中亚当地民族还以实际措施推进穆斯林教育。1908年以后，在俄国殖民地布哈拉汗国开始了教育改革，并于1910年成立了一个“青年教育会”以专门从事穆斯林教育，推动穆斯林教育的发展，促进穆斯林民族意识的觉醒^③。

以上一系列活动表明，沙皇俄国在中亚建立的殖民统治促进了中亚当地民族自我意识的迅速觉醒，中亚当地民族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已开始了要求民族权利、民族地位的斗争。

中亚各族人民对沙皇俄国的军事征服曾进行过坚决的抵抗，当中亚被沙俄征服后，当地民族，尤其是当地民族的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牧民等社会中下层人民依然坚持不懈地通过武装斗争等激烈手段来反对沙俄的殖民统治，表现了不甘屈服的民族意志。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6年爆发的中亚各民族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起义。这场起义开始于1916年7月4日，当日在突厥斯坦商业和工业中心之一的忽毡（现塔吉克斯坦的忽毡市），有3000多名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沙俄当局的“非俄罗斯民族征兵”政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抗议活动不断扩大，到1916年9—10月，已扩展到了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广大地区，并发展成由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吉克、卡拉卡尔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民族大起义。在这场起义的打击下，有2325名俄国殖民分子被杀，有1384人失踪，仅在七河州一地，就有

^① Jacob M. Landau,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52—155; Central Asia, pp. 186—187.

^②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pp. 187—188.

^③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pp. 194—200.

9000 个俄国殖民户和农庄被摧毁^①。沙皇俄国的军队对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16 年 8 月 13 日，俄国国家杜马议员 A. Ф. 克里尼基什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揭露道：“由步兵、炮兵和骑兵组成的军队不分男女老幼，打死了路上遇到的所有当地居民。”^② “成千上万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被打死，吉尔吉斯许多县城和村庄的经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③ 当时约有 12 万吉尔吉斯人逃到了新疆^④。这场起义虽然最终被沙俄当局残酷镇压了下去，但是它却给沙俄的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中亚地区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

1917 年 2 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推翻了沙皇政府。这为中亚各民族的自决创造了可能性，带来了希望。1917 年 5 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会议提出了穆斯林民族的自治问题。中亚的穆斯林代表倾向于联邦制的主张，要求在联邦政府内实现地域自治^⑤。因为，“对于中亚人来说，地域自治似乎是针对其土地上的殖民统治与外来势力的一种答案”^⑥。同年 9 月，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二届穆斯林大会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内以沙里亚教法为基础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即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要求^⑦。

总之，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中亚（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自决问题已变得十分紧迫，它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敏感问题，直接关系到中亚（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的稳定和安宁。当然，对这一时期的中亚各民族（包括吉尔吉斯族）来说，民族自决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殖民统治下寻求保护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权益上，这是十月革命前吉尔吉斯斯坦乃至中亚民族自决的一个显著特点。

^① 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沙皇俄国侵略扩展史》（下），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8 页。

^② Знамя киргизии, 1991, 7 ноября.

^③ Ibid. .

^④ Ibid. .

^⑤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pp. 217 – 218.

^⑥ The Politics of Pan – Islam, pp. 158 – 159.

^⑦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p. 220.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自决问题

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开创了吉尔吉斯斯坦历史的新纪元，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苏维埃民族自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如何对待像吉尔吉斯族一样被沙皇俄国奴役压迫的少数民族的问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俄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提出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列宁在《191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在沙皇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各民族自决权，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无疑是社会民主工党应当拥护的。这是国际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尤其是遭到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压迫的俄国大多数居民的要求。”^① 在1913年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中，列宁又强调：“在现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直到如今还无所不为的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②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依据无产阶级民族观，科学地分析了民族殖民地问题和俄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制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纲领和政策。1917年11月15日，列宁和斯大林起草的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名义发布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宣布：（1）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主权；（2）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自由、自决乃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3）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4）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③。接着，由列宁和斯大林起草通过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又郑重宣布：

“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机关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受侵犯的，自由地、无障碍地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② 《列宁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

③ СУ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РСФСР)，1917，No. 2，стр. 18.

权利这样做。”^①

为了切实保障各民族的民族权利，列宁进一步提出，苏维埃联邦制和苏维埃自治是建立民族国家最适当的形式。列宁指出：“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强制，它的基础是充分信任，明确意识到兄弟般的团结，完全自愿赞同。”^②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除自治，反而以必须实行自治为前提。”^③ 斯大林则在《当前的一项任务》一文中详细阐述道：“为了使（边区苏维埃）政权在那里成为人民的政权，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的群众，就必须以特有的方式以吸引这些边区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群众进入革命发展的过程，就必须发动群众投向苏维埃，这是他们最优秀的代表，要和他们融为一体，但是没有这些边区的自治，这是不可能的。”^④ 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否定边区自治的错误，斯大林明确指出：“必须把他们（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者注）的自治拿来，先把它们从资产阶级的圈子中清除出去，把它由资产阶级的自治变成苏维埃的自治……不是否定自治，而是要承认自治，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只有在地方上以苏维埃方式建立起这种自治，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政权才能成为人民的和为群众亲近的政权。”^⑤

1918年6月10日，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的民族自治政策被写进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宪法》之中，从而赋予苏维埃自治以法律的力量。该宪法第五款写道：“以特有的生活和民族成分为特点的州苏维埃可以联合成自治的州联盟……这样，自治的州联盟以联邦的方式加入到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⑥

总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苏维埃自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① СУ, 1917, No. 6, стр. 2.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70页。

⑤ 同上。

⑥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захской А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 – Ата, 1957,* стр. 84.

和实践指南。

(一)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在吉尔吉斯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实现吉尔吉斯苏维埃民族自治的基本保证和前提条件。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上已出现了苏维埃组织。1917年3月6日，在克孜尔—基亚（Кызыл – кия）煤矿，选举产生了吉尔吉斯地区的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3月14日，又在苏柳克塔煤矿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①。接着，在比什别克（Бишкек，即现在的 Бишкек）、奥什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工人或士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10月28日，在当时吉尔吉斯斯坦隶属的突厥斯坦边区的中心——塔什干，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和士兵武装起义^②。起义击溃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突厥斯坦的卡罗维切夫（Каровичев）将军的部队，取得了胜利。1917年11月15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塔什干召开，会议通过宣言，承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央政权，大会郑重宣告苏维埃政权在突厥斯坦建立，边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是突厥斯坦最高的权力机构^③。在塔什干苏维埃取得政权胜利的鼓舞下，吉尔吉斯各地开始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吉尔吉斯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比起俄国中部和塔什干来要明显复杂和困难些。这是因为，一是吉尔吉斯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二是吉尔吉斯地区农村牧区存在着浓厚的氏族宗法残余，旧势力的影响很大；三是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隔阂和矛盾。由于以上原因，吉尔吉斯地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群众基础相对较弱。

吉尔吉斯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最早是在工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建立起来的。1917年11月，隶属于撒马尔罕州的苏柳克塔煤矿的矿工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29日，苏柳克塔苏维埃政权被突厥斯坦边区人民委员会正式承认^④。自此，苏柳克塔地区开始处于苏维埃政权的管辖之下。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ии, т. II. Фрунзе: Киргосиздат, 1963, стр. 37.

② Победа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т. I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ашкент: АН УзССР. 1963, стр., 543.

③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ргизстан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1917 – 1967. Фрунзе: Кыргызстан, 1983, стр. 20 – 21.